

本刊6月號和8月號連續兩期推出反思改革二十年的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的專題評論，引起不少讀者關注。他們以短信方式參與討論，各自提出見解，與作者和其他讀者共享。我們期盼更多讀者參與討論。

——編者

而今「雄關」如何越？

《二十一世紀》6月號和8月號「反思改革二十年」的兩組文章，角度觀點各有不同，但大多數文章似乎對當下的中國改革有一個共同的判斷：中國改革已到臨界點——非進行政治改革不能成事。就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問題來說，如果不是像一些著名經濟學者批駁楊小凱先生的後發劣勢一樣搞投機，並不難得出肯定的結論。

核心的問題不在於應不應該「過大關」，而在於這種「過大關」是否必然要以激烈衝突的形式來完成。更進一步說，假如相信歷史存在各種可能性，當事者又能否做到預判盡量平穩的過渡前景，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尋求理想的過渡模式？對於政治改革是否會引起激烈衝突的問題，通過當代史分析還可以捉摸一二；而對後一個問題，則太像搞預言，很少人會有諾查丹瑪斯那樣高的準確率。

吳國光先生認為中國原有路徑的改革已經資源耗盡，將近終結，如轉入非經濟改革路徑，則是轉入激烈衝突而非漸進的未來。季衛東先生則認為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未必如此，以司法改革為基礎的政治改革搞得不好，未嘗不可以避免劇烈的動盪。卞悟先生也認為存在一點歷史機會，如果借做大蛋糕來一定程度化解矛盾，也未必不可以衝出歷史大峽谷。這一歧見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鄒讜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對1989年事件的反思。他認為曾有一種和解的微弱歷史機會，但是當事各方都沒有抓住，而民族心性結構中也缺乏以和解的方式化解衝突的基礎。

當年如此，現在也如此。季衛東先生的設想相當有道理，但問題在事實層面：司法改革乃至政治改革如何得以啟動，又如何能有默契的目標？支持此種改革的利益群體何在，他們與其他利益集團周旋的政治智慧何在？不可想像沒有支點的改革，現在看起來仍然微薄的歷史可能性，如何能夠變得大一些？殘酷的歷史卻經常是，理想狀態只是理想而已，往往就是那很少可能的未來，可資努力卻可能應者寥寥。歷史是當事者的歷史。

所以，從比較困難、比較悲觀的角度來預判歷史，首先應當去嘗試詢問哪些是最有可能的未來，從而把握那些最能

主宰歷史的力量，理清應然與實然。這未必沒有好處，所謂未雨綢繆，學術分析也當如此；多一種設想，未來便可能會多一些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吳國光先生的分析，雖則有些強斷，卻不無裨益。

余岩 北京

2002.9.16

應有精英與大眾整合的 均衡態勢

在西方民主政治之外設定草根式的「行政吸納政治」這條道路，香港走過。這已被金耀基揭示，而貴刊2002年8月號康曉光的論文〈90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研究〉則將上述理論作「大陸性」延伸。中國發展實現了管理、經濟、知識三個精英層的機會均等、利益均沾與政治的共同參與，創制了大陸型的「行政吸納政治」。

這一切應對着東方政治哲學的重要原則：「均衡態勢」，成為中國穩定的重要體制原因。然而這一切是在「精英集團」的層面實現的，是在「航船」的駕駛艙內實現的，那麼「乘客」呢？與精英不在同一級別上的「大眾」呢？

康曉光文章關注着這一點，在提出「精英整合」的同時

又提出「精英與大眾的整合」的課題，注意到精英與大眾的總體均衡態勢。

20年來，中國精英組合變動與序列置換，實現了資源總量的再分配。要省視的是：即刻是否已經出現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均」「平」失衡？「不均」是物質的，「不平」是心理的，某個群體經濟利益與心理態勢變動失衡，就有可能成為社會的「動盪源」。

中國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集體富裕」、「扶貧」及「開發西部」理論的產生與實踐成為中國20餘年大眾層政治穩定的制衡器。所願的是切實有效地繼續運轉，由此中國航船「駕駛艙」及「乘客艙」的「均衡態勢」一同持續，同舟共濟，國運長久。

盛邦和 上海
2002.9.5

以地方為主體來推動政治改革

捧讀了《二十一世紀》今年8月號上季衛東題為〈漸進改革的新動力——從「化整為零」到「合零為整」〉的文章，一時眼下一亮，真有「柳暗花明」之感。季衛東回顧改革開放20年來「化整為零」的過程，主張以全國政協為切入點，重新啟動政治改革。但是，這一「合零為整」的方案仍是「為君立言」的立場，在推動改革的主體缺席的情況下，再好的計劃也是無從實施的。

這20年「化整為零」的過程是權勢轉向地方。在地方權勢者身後隱藏着一個中央本位的國家蛻變成地方本位的國家這一事實。高行建在《靈山》中用

文學的語言，描寫這過程實際上產生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鬆動與地方文化再生。他寫道：「做了老婆的女人又把丈夫叫做老公，你的老公，我的老公，這裏人有這裏人的語調，雖然都是炎黃子孫，同文同種。」人們突然意識到「炎黃子孫，同文同種」這樣的近代用語背後實有一多元地方文化共同體，人與人的自然倫理也從此前的「同志」關係中蘇醒過來。原來「漢民族也有一種不受儒家倫理教化污染的真正的民間文化！」高行健還對近代中國的「常識」提出了疑問：「魯迅詩文中有句『我以我血薦軒轅』……發揚祖先為甚麼偏要用血？」這個問題的分量很重，意味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現在季主張「合零為整」從邏輯上還是在走「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老路。

有位明史專家認為「地域經濟的發展，本來是社會的底層運動，並不為政治家們所重視。但國家的經濟大局，恰恰是無數個地域經濟的組合。」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要從這一視角出發，使地方真正成為一個主體以此來推動全國的改革，而全國規模的改革也只有把地方作為目的與終極目標才會獲得源頭活水。

天民 杭州
2002.9.23

政教分離與合理的社會空間

2002年6月號的《二十一世紀》登載了徐友漁先生的大作〈社會轉型和政治文化〉。徐先生提出，在面臨重大變遷的當代，知識份子的當務之急是

建構一個反對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徐友漁先生認為：「中國思想界在70年代末面臨着一個極為艱巨的歷史任務，這就是：徹底清算毛澤東主義，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專制性質，……」徐先生認為我們之所以沒有抓住這次建設新政治文化的機會，一方面是由於在體制內有一定地位、在社會上有相當號召力的知識界領銜人物，對民間批判與反省的力量重視不夠；另一方面是由於老一輩「本質上是毛主義者」。

我認為，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中國專制主義在歷史上的成形，與「中國式的政教合一」有關。「中國式的政教合一」政權本身則是無神論的，無神論的中國專制政權自然不會去尋求宗教的支援，而是自己提出了一套有宗教特點的關於宇宙人生的意識形態，然後又把這一意識形態的權威加冕給專制政權的最高領導或政黨領袖。這樣，中國的專制主義政權不僅有政權的資源維護統治，更有偽神權的「信仰」資源維護統治，而與信仰相連的倫理道德權威也成了其維護統治的工具。

不過我們看到，隨着中國社會的世俗化，「政教分離」的條件正在成熟。盼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社會的信仰力量和學術力量能得到合理的存在空間而健康生成，自然承擔起「政教分離」由政權身上所分離出來的「教」的任務。

江登興 北京
2002年9月3日